

兰州大学教材建设基金资助

2014 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 (14LZUJBWZD010)

兰州大学甘肃电信萃英科研基金资助 (lzudxcy-2014-10)



花儿研究

——文学性与音乐性关系及传承

周亮 / 著 民族出版社



花儿研究

——文学性与音乐性关系及传承

周亮 / 著 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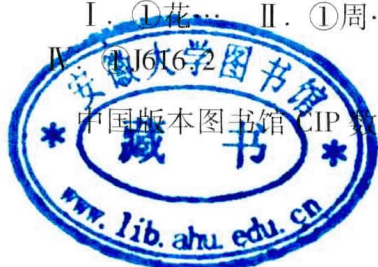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儿研究:文学性与音乐性关系及传承/周亮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12

ISBN 978 - 7 - 105 - 13676 - 6

I. ①花… II. ①周… III. ①花儿(音乐)—民族音乐研究
IV. ①J6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9579号



责任编辑:唐海琴

封面设计:金 晔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e56.com.cn>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7.25

定 价:24.00元

ISBN 978 - 7 - 105 - 13676 - 6/J · 699(汉35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前 言

花儿是中国西北地区 9 个民族共同传唱的民歌，在特定的环境中已生存繁衍了数百年之久。它以即兴而起的创作演唱、独具一格的曲令调式、生动直白的情感表达，彰显出特有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民歌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花儿不仅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同时又兼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情感共融的特殊内涵，涉及内容广泛且深刻，称得上是解读中国西北地区社会发展的一部“百科全书”。2006 年 5 月 20 日，花儿被批准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被正式列入我国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备选项目。2009 年 9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甘肃花儿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花儿的存在价值从此得到了举世公认。

本书分为 5 章，各章既相对独立，又互为结合。笔者运用历史的、哲学的、艺术的方法，对花儿文化进行了多角度、逐层次的分析论证，着力于挖掘花儿文化的特性和内在价值，为重新认识花儿这一民间文化瑰宝提供理论依据；由上述研究自然引申到对花儿传承危机的关注，顺着花儿的产生、发展与生存环境的关系这条主



线，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找出了花儿当代生存危机的根源所在，用发展的理念思考花儿保护传承的策略，提出了用高校教育与民间传承结合起来化解花儿生存危机的见解，并阐述了高校教育传承的优势和长远意义。

第一章“花儿起源与流布”，对促成花儿形成的主要因素，从社会历史和多元文化、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地域生活方式和民俗风情、地域自然和地理特点等方面依次论述，说明了花儿的成因。对造成花儿流布的内外条件，从地理的、历史的、经济的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厘清了花儿流布的来龙去脉。对花儿流布的范围、流布过程中的变化，按照地域、类型、民族进行了划分。

第二章“花儿的文学性”，简述了花儿作为活态口传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通过具体例证说明了花儿表现的人生情境和情感世界。通过对花儿歌词的梳理，总结出花儿的方言和格律特色及使用规律，阐述了它们对于花儿特性形成的重要意义。从对花儿艺术构思的分析中，说明了花儿即兴创作的特点。

第三章“花儿的音乐性”，从花儿曲令的产生和衍生变化、曲令的旋律形态、民族特点等方面论述了花儿的曲令概况和音乐特性；从花儿的演唱风格、演唱形式和形态等方面展现出原生态花儿的真谛。书中专门对“现代花儿”的音乐特点做了介绍和一定的分析，以此说明花儿音乐的发展变化趋势。

第四章“花儿文学性与音乐性的关系”，通过对花儿歌词与曲令关系的深入分析，说明了花儿文学性与音乐性互为条件、互为制约又互为补充的内在联系。通过对现代“花儿剧”的剖析，解析了花儿文学性与音乐性在演变过程中的结合。

第五章“花儿现状与传承研究”，分析了花儿民间传承对环境的依赖性和相应的局限性，说明花儿在现代社会发生演变的必然性；从对花儿生存现状的分析上，论述了花儿主体及传播方式的改



变所引起的传承危机，提出了对花儿保护和传承的策略。并从学术创新和实际应用的角度，提出了把高校教育作为花儿传承的新的平台。从高校教育与民间传承的分析对比中，阐述了高校教育的诸多优势，并列举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说明高校教育传承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文后附录“花儿研究相关史料”，在收集、整理大量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花儿研究成果和有关活动进行了归纳，使其更具资料性和学术性。

目 录

第一章 花儿起源与流布	(1)
第一节 花儿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1)
一、民族迁徙和文化共融	(2)
二、地域经济和社会状态	(7)
三、地方民俗及发展演化	(9)
四、自然环境的潜移默化	(11)
第二节 花儿的流布	(13)
一、流布的主要路径	(13)
二、流布的基本动因	(14)
第三节 流布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花儿	(17)
一、不同地区的花儿	(18)
二、不同类型的花儿	(21)
三、不同民族的花儿	(23)
第二章 花儿的文学性	(31)
第一节 花儿的文学性命名与探源	(32)
一、花儿的文学性命名：象征隐喻	(32)



二、花儿的文学性探源：与诗词的联系	(34)
三、活态口传文学的花儿	(36)
第二节 花儿表达的人生情境	(41)
一、山里人的歌	(42)
二、出门人的歌	(43)
三、屋里人的歌	(45)
四、情人间的歌	(46)
五、控诉者的歌	(48)
六、赞美者的歌	(51)
七、孤独者的歌	(51)
八、劳动者的歌	(52)
第三节 花儿的语言及格律特色	(54)
一、凸显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	(55)
二、与中原诗歌不尽相同的格律	(58)
三、别具一格的歌词艺术构思	(65)
四、花儿“本子歌”的特征	(67)
第三章 花儿的音乐性	(72)
第一节 花儿曲令的产生及扩展	(73)
一、曲令形成的历史过程	(73)
二、曲令类型的衍生发展	(74)
三、曲令分布的主要范围	(77)
第二节 花儿曲令的形态及内涵	(78)
一、旋律的基本形态与情感	(78)
二、旋律的音级进行与情感	(83)
三、旋律的重复递进与情感	(85)
四、旋律的节奏速度与情感	(88)



第三节 花儿曲令的多民族特征	(89)
一、曲令的一般音乐形式	(90)
二、曲令体现的民族异别	(92)
三、曲令调式上的民族色彩	(96)
第四节 花儿的演唱特点及意蕴	(99)
一、演唱的基本表现形式	(99)
二、传统唱法和演唱风格	(101)
三、真假声和手势的诉求	(104)
四、现代演唱出现的演变	(105)
 第四章 花儿文学性与音乐性的关系	(107)
第一节 文学性与音乐性的相互依存	(108)
一、歌词与曲令的内在联系	(108)
二、歌词与曲令的灵活填配	(110)
三、曲式与歌词的结构对应	(112)
四、程式与词曲的约定俗成	(115)
第二节 文学性与音乐性的互为制约	(118)
一、曲式结构对歌词格律的规范	(118)
二、地域方言对声乐旋律的牵制	(121)
三、歌词内容对音乐基调的推动	(123)
第三节 文学性与音乐性的互为补充	(128)
一、衬词对曲式结构的完善	(128)
二、衬腔对音乐形象的烘托	(132)
三、声状抒情对词意的加强	(134)
四、音乐表现对语言的扩张	(136)
五、词曲交融对功能的提升	(137)
第四节 文学性与音乐性的现代组合	(141)



一、文学特征的演变与扩展	(141)
二、音乐特征的演变与扩展	(143)
三、演变下的文学与音乐的统一	(145)
第五章 花儿现状与传承研究	(148)
第一节 花儿传承基本方式及特点	(149)
一、口头传承	(149)
二、文本传承	(151)
三、民俗传承	(152)
四、生活口传	(153)
五、当代传承	(155)
第二节 传承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56)
一、花儿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156)
二、花儿会传承性逐年减弱	(159)
三、花儿演唱主体瓦解分化	(160)
四、现代传媒加速传承危机	(162)
第三节 花儿传承保护的策略	(164)
一、花儿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	(164)
二、加强传承主体的培养保护	(168)
三、民间传承与高校教育结合	(169)
四、花儿与旅游业的相互促进	(170)
第四节 高校教育传承的尝试	(172)
一、高校教育传承的意义	(172)
二、高校教育对人的培养	(173)
三、高校课程的合理设置	(174)
四、高校传承的广阔前景	(177)



结 语	(181)
参考文献	(186)
附录 花儿研究相关史料	(207)

第一章

花儿起源与流布

花儿产生于甘青之交的河湟地区。那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天地塑造出它的性格，日月累积着它的灵气。远古文明的火种把这里点亮，曾经燃烧出原始艺术的辉煌。气候的剧变裹住文明的光芒，这块土地重又归于黯然。它在孤独中等待，迎接新的文明的到来。历史的脚步踏破岁月的沉寂，征服的眼睛盯向这片空间，随之是诸多的民族向这里聚拢，战争、迁徙、屯田、商贸……一幅幅历史的图像交替闪过。在沉重的历史变迁中，在血与火的重生中，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悄然交汇，各异的民族文化在相互渗透。在多元文化共融的沃土上，孕育出各民族共有的花儿。它是艺术之花，它是生命之花，它以独特的语言和曲调、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唱响河湟大地，飘向遥远的天际。它越飘越远，飘向了宁夏、飘向了四川、飘向了新疆，又越过国界飘向中亚……

第一节 花儿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花儿作为地域色彩和民族风格十分鲜明的民间艺术，既是一种



音乐事象，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对花儿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必须把它放在一个文化体系之中，才能看到它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准确把握它的基本内涵。毫无疑问，花儿是特定地域文化的子系统，其所承载的文化象征意蕴和情感表达方式，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它用即兴创作演唱的形式，为社会的一个确定群体争得话语权，表达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花儿因此在其流传地域发挥着它特有的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艺术的要求，原是一种基本的需要，从这方面看，可以说人类有机体根本有这种需求，而艺术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满足这种需求。”^①而人的需求则又是由人所处环境的诸多因素决定的，这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文化传统，乃至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等等。我们对作为民间艺术的花儿的研究，应该深入到艺术和审美经验产生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具体的起源过程，考察它的“艺术生产场域”和其“生产”、“接受”的机制。在影响花儿起源和发展演变的这些机制和关系中，多民族文化背景、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地域环境、生活方式及民俗风情等是最重要的因素，它们共同决定了对花儿这种特殊艺术的需要。

一、民族迁徙和文化共融

花儿起源地的河湟地区自古就是民族迁徙、聚散之地。从早期诸羌的分化到藏、汉势力的交相进入，从元代回回人的迁入到回

^① [英] 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85~86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新民族的出现，直到明代中央政权和大批中原移民的进驻，河湟地区逐渐成为多民族的稳定聚居地。民族共融、分化的过程也是文化融汇发展的过程，最终形成与多民族共存状态相对应的多元文化。

（一）多民族的汇聚与共融

秦、汉时期，在今甘肃临夏和青海民和一带就有诸羌活动，绝大部分时间内，河湟地区属于羌、戎、鲜卑、吐蕃等部族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年，西汉政权短暂进驻河湟地区，将一部分羌人安置于该地区从事农业，史称“屯羌”，这是汉民族与当地其他民族相共融的一个重要时期。唐末至宋初期间，民族间经济往来空前活跃，处于吐蕃控制下的河湟地区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茶马互市”，内地茶商和远近番人云集于此，增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与了解。元初开始，蒙古族统治者将一部分戍边屯田的回回军士以及贡使、商贾等波斯人、色目人、阿拉伯人和维吾尔人陆续安置到该地区，多民族杂居成为河湟地区特有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民族间的共融成为历史的必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乡、保安、撒拉、裕固等民族，汉族除由内地迁徙定居者外，很大一部分是由河湟原少数民族演变而来。不同民族的杂居和相互间的共融，是花儿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多元文化的逐步形成

文化的融会是与民族的共融相伴而生的，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①。我国西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聚居着众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的少数民族居民。汉族在河湟地区的生存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其他族员加入到自己民族，成为民族共融的复合体，在客观上对各民族的交往共融、带动各民族共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共融为民族间的文化交融提供了条件，汉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渗透到其他民族文化中，与此同时又吸收了各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精粹，极大地丰富了汉文化，最终成为被其他民族所承认和接受，并引领各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异族以强力入主中原后却为汉文化所同化的现象，河湟地区也类似于这种情况，加之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使汉文化圈得以形成并不断扩大。

藏族是青藏地区原有居民与古羌人的一支共融而成，到唐代时已发展为吐蕃王国，取代了羌族在河湟地区的统治地位。藏传佛教传入河湟地区的历史十分久远，因此一般认为河湟地区是西藏佛教后弘的发祥地之一。藏传佛教文化也因吐蕃在河湟地区长期统治的原因，具有稳定的根基和深厚的影响。藏传佛教的主要信仰族群有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可以说，历史上河湟地区各族除汉族外，藏族历史最久，文化传统最为深厚。因此，尽管藏文化圈的人口数量较少，但它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是不容小视的。

伊斯兰教是在元朝初期，从中亚、西亚签发到河湟地区的回回人带入的。伊斯兰教当时已是传播亚洲、欧洲、非洲的世界性宗教，它已远远超出信仰的范畴，成为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在族际关系之间起着纽带作用。伊斯兰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其信仰和教规影响着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因此，伊斯兰文化圈尽管形成较晚，但却非常稳定和紧密，而这一文化圈里的回、东乡、保安、撒拉诸民族则都是花儿传承和播布的主要承载者。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渗透和共融，逐步形成河湟多元文化的基本脉络，从最早的五大属系，即汉文化、羌藏文化、吐谷浑文



化、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最终发展为以汉文化为主流，藏文化、伊斯兰文化与之并存的三大文化圈，这即是花儿形成的文化大背景。正如中国最早研究花儿的张亚雄先生所概括的：花儿为汉语、回调、番风之优美民间文学^①，其中汉、回、番亦指三大文化圈。

河湟地区的多民族历史，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多元文化，无不渗透到该地区民众的民俗民风 and 审美意识之中。花儿文化正是产生于河湟多元文化的基础之上，同时又不断地汲取着各民族文化的精粹，这也是花儿之所以扎根于民间，成为不同族群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认同文化纽带的根本所在。

（三）远古彩陶文化的潜在影响

文化的延续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不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断裂。中国彩陶文化是远古文明的高度体现，它在现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可能会因历史过于久远而变得模糊，但它的文化基因不会因此消失。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正在找回失落的文明，在对远古彩陶文化认知的同时，也隐约在现存文化中看到了它的影子。

多年来的田野考古研究证实，河湟地区曾出现过远古文明的繁盛期，中国彩陶中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更晚一些的辛店文化等在这里汇聚，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文化网络。在一块相对狭小的地域遗存有如此多的文化类型，这在中国彩陶史上是很特异的现象，其中必有其复杂的文化背景。

从以往的研究所知，远古先民们分属于不同的部落和部族，因

^① 武宇林：《回回民族与“花儿”歌谣》，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2）。



地域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他们的审美意识各不相同，具体表现在彩陶文化上，就出现了丰富多彩、意蕴不同的文化类型。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或继承发展，或彼此影响，或相互交融，共同写下了河湟远古文明史上不朽的一页。在人类社会步入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大地上，先后产生过十几种彩陶文化，其中每一种文化不仅代表所在地域的文明发展程度，而且反映出不同地域的文化艺术特色。彩陶顾名思义就是用颜料在素陶身上绘制纹饰，人们把心中所想绘制成为各种图案，众多不同的图案构成了他们生活的画卷，其总体内容有鲜明的精神崇拜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带有“图腾”意义的符号。

不同的符号代表不同的族群及他们的文明特征，河湟彩陶文化出现了两种以上的符号，根据纹饰所表现的内容可分为两大类，分别代表了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在马家窑文化中晚期彩陶中，纹饰多为抽象的几何图形，以繁茂致密、整齐对称为基础特色，同时出现了不少表现田地和农播的纹饰，较为具象直观，从中可以想象到农耕民族对土地的崇敬以及性格上的保守和中规中矩。同一时期的齐家文化（因发现于甘肃临夏广河县齐家坪而命名）与马家窑文化在风格上完全不同，纹饰寥寥几笔、简单洒脱，但在器型上却比马家窑文化复杂，尤其是各种动物状器型所占比例较大，是其他文化类型远所不及的，这其实正是游牧民族生命情感中对动物的崇拜所致。在这之后的辛店文化（因发现于甘肃临洮辛店而命名）对游牧生活的反映更为直观，它的彩陶纹饰大多由动物纹构成，如犬纹、鹿纹、蜥蜴纹等等，在这些纹饰中常伴有太阳纹出现，还有第一次在彩陶纹饰中发现的狩猎图。这些纹饰都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表达了马背上的民族对自然的由衷崇拜。另外，从辛店文化分布的范围看，和古羌族的活动范围差不多，这也为研究河湟文化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新的凭证。当然，彩陶